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明清部分）述评

周正庆　余新忠

为纪念校庆八十周年暨郑天挺教授百年诞辰，由南开大学主办的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9年8月30日至9月2日在天津召开，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各省市的11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或论文提要百余篇，其中有关明清（包括晚清）的65篇。会议期间，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既勇于对不同观点提出坦诚的批评，也能够对言之成理的不同意见予以充分宽容，体现了良好的学风。以下就从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政治和科技五个方面对本次大会有关明清史（包括晚清）的发言和论文作一综述。

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这次大会也予以了较多的关注。不仅有关论文在各类论文所占比例最大，而且也相对较具特色。其主题主要包括家族、人口与婚姻、社区与民众信仰、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等。

关于家族，冯尔康（南开大学）在其所作的题为《20世纪中国社会各界的家族观》的大会发言中指出：本世纪社会各界对宗族的态度基本可分成五派：民众中守旧派、民间革新派、思想文化上的批判派、改造派和共产党革命派。对家族实行强行消灭，虽不无意义，但并不真正解决问题。对现代社会来说，家族尽管有着众多的局限性，但至少在现阶段，还拥有不少难以取代的社会功能。阎爱民（南开大学）《论宋明以来家训著作编著的通俗化趋向》一文认为家训自宋明以来出现了通俗化趋向是在社会平民化、文化下移和宗族组织民众化的背景下出现的，是近世以来社会变迁的产物。常建华（南开大学）的《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和徽州地区为中心》认为明代士大夫受《家礼》的影响，倡导并实践祭祖礼仪，从而使祭礼与祠堂进一步普及，而这也正是嘉靖以降宗族祠庙祭祖发展的基本动因。赵结（美国南缅因大学）《晚明中央与地方政治中大家族的作用》一文指出，地方大家族通过座主门生关系、地域乡情之谊、姻亲关系在政权和地方社会中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吴一焕（韩国庆熙大学校）《清代朝鲜明遗民的寻宗访祖与修谱活动述论》一文对明遗民在清代回故国的修谱与寻宗访祖活动的背景、情况、原因与特色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梁洪生（江西师大）《辛亥革命前后江西谱论与社会变迁》在全面普查江西公藏谱牒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十六年共32年间修撰的154部谱牒，藉此探讨了辛亥前后谱论的两大变化。

人口与婚姻方面，王兴亚（郑州大学）《明代人口统计中的女口》一文认为在研究明代人口统计数字时，不能简单地认为其统计数字中不包括妇女在内；应看到前期与中后期的变化，注意妇女中大口与小口问题，以及各个地方之间的差异。栾成显（中国社科院）的《明代户丁考释》指出：明代“户丁”一词的含义应包括：一，指一户之下的成丁男子；二，指大户之下析产而未正式分户的子户而言；三，从赋役制度方面说，户丁一语亦具有职役之意。徐晓望（福建社科院）的《明代福建的人口统计问题》认为导致福建在明中期以后成为官府籍册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区域的原因在于明代福建变相的人口税最为沉重。经数百年官府、胥吏和百姓三者之间的互动协调，

最后达成一定的人口比例，以此确定徭役负担。郭松义（中国社科院）《清代的人口流动与婚姻地域圈》一文认为，清代人口的大量流动、迁徙，给原本封闭的婚姻圈打开了一个缺口，它不但改变了流迁者婚姻的地域格局，也给迁入地的婚姻关系注入了新的内容。王跃生（中国社科院）的《十八世纪中后期中国婚姻状态分析》通过对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间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的计量研究发现：50岁以下特别是39岁以下的人口中丧偶和独身的低水平，使大多数家庭的生育过程不至于中断；有超过半数的丧偶女性在现实困难和各种压力的驱迫下再次婚配。

这次大会对民众信仰与心态的研究大多置于具体的社区中展开，同时也有些学者从社会控制和整合的角度对社区进行了研究。赵世瑜、张宏艳（北京师大）《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一文指出，刚铁和黑山会的故事说明，宦官这一集团并不只是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的过客，他们通过寺庙与民间社会发生联系，构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特殊中介。吴建华（苏州大学）《晚明江南的的社区传播与大众心态——“民抄”董宦事件的个案分析之二》，论述了各种社区传播形式在松江“民抄”董其昌家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认为董家被抄，虽然咎由自取，不过社区传播在大众集合行为中的作用亦不可忽视。侯杰（南开大学）《目连戏与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系统考察了明清以来目连戏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流变，集中探讨目连戏与民众宗教，与民间信仰以及民间请神仪式的关系问题。朱鸿林（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从沙堤乡约谈明代乡约研究问题》，认为明朝幅员广大，风土之异使得多样并存成为社会、礼俗制度的常态，但一元的士大夫意识形态又使得一道同风的要求和相应的制度不断出现。因此对乡约不能一概而论的研究认知是必要的。太田出（日本大阪大学）的《清代州县佐杂之管辖区域及其作用——以江南三角洲市镇所进行之分防为探索点》指出，在长江三角洲，分防的佐杂一般都领有以“图”或“圩”为单位的一定管辖区域，其角色犹如以市镇为核心所形成的此一空间的行政官即“镇长”。这一现象表明，到清代，江南三角洲农村的治安开始由官府即国家权力自己来负担。张思（南开大学）《从近世到近代，华北农村的社会结合——顺义县沙井村村落生活实例》一文指出，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可以看作是华北农村社会从近世迈向近代的重要转折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往日村落生活中的那种余裕和从容不迫慢慢地消失，生存竞争、利益计较随之而起，越来越显露出“近代的”特征。

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阶层与群体方面。游子安（香港城市大学）《善与人同——清代善人、善书与善事》一文认为清代善书的流行，与当时善人的努力、善堂的兴起有密切的关联。清代江南的善人已出现与其独善，不如与人同善，以达致天下同善的思想。封越健（中国社科院）《论清代前期商人的社会构成》一文指出：清代商人的等级构成包括从皇帝到贱民所有七个等级的成员，职业构成则包括自身以外的八种职业人群和流犯、乞丐等无业人员，其主要社会构成则是凡人等级中的农民。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吴藻交游考》认为清中叶以后，女子社交生活较前自由得多，吴藻等人已隐然有一份不甘囿于闺阁，要冲破封建社会对妇女约束的精神和思想，这实在是清中叶以后这位妇女解放先驱的心声。汪丹、汪兵（天津师大）《论（仁学）与近代士人的知识结构转型》考察了以《仁学》为代表的戊戌时期年轻士人知识结构的转型特征及其对后代的影响。王戎笙（中国社科院）《浅议晚清留学生考试》指出，清政府较重视归国留学生的毕业考试，对留学生出国前的培训和考试到宣统元年才实行。而毕业考试保留较多科举痕迹。郑振满（厦门大学）《晚清至民国的乡镇商人与地方政局——以莆田县涵江镇为例》一文指出：涵江商人的经营之道，具有明显的家族化倾向。其组织的会馆与商会一度成为社区权力中心，并长期与当地豪绅势力相抗衡，直到民国后期，才被迫退出地方政治舞台。张国刚（南开大学）《清末民初外国侨民在华生活实录——华德铁路公司总办皮特·锡乐巴的家清单跋》一文，利用在锡乐巴故乡发现的个人档案中的一份家清单，通过一实例反映出外国侨民在华生活的一个侧面。在社会生活方面，王振忠（复旦大学）的《一个徽州山村社会的生活世界——新近发现的“歙县里东山罗氏文书”研究》认为徽州文书的研究，除了应继续关注土地关系、诉讼案卷和商业文书

之外，还需广泛收集和整理民间收藏的有关民俗、文化方面的文书史料。吴仁安（上海师大）《清代江南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浅说》一文认为，以往学界对清代江南地区的风俗民情注意不够，故根据一些清代笔记、家乘、方志等史料对清代江南民俗与社会生活作了探索。

此外，一些学者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对原本属于文化史、政治史的内容作了社会史的考察。范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一文认为，通过观察方志对帝国的描绘，可以反映出那些授意绘制地图的学者和官僚们关注、预设的事物及他们的价值观所在。李来福（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地方史撰写的反思——以1994年（山东通史·明清卷）为例》通过对文本的反思，探讨了省份如何划界，省是表现为一个同质结构，还是在内部尝试着多样化发展等问题。杨启樵（日本姬路独协大学）《雍正朝御用作坊的人人事事》一文主要利用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活计档”，论述了雍正朝的一个小衙门——内务府造办处的人与事。指出通过“活计档”，可以钩沉出众多淹没不闻的民间艺术家的历史。余凯思（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1897－1914年间德国在胶州湾的殖民地》指出：争夺经济资源与其他利益的中德冲突时常发生，但双方政府都出于对安定的需要而各自设法控制冲突，以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殖民宣传成功地展示了殖民者是一个先进近代社会的代表，以致部分中德两国精英分子都被其蒙蔽。

明清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与会学者较多的关注。一些与会者围绕着区域经济以及近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等问题展开的讨论。徐永志（中央民大）《开埠初期直隶城乡通商贸易初探》认为直隶城乡社会的近代化的动力为外力，即“西力”，而不是“内力”，以“西力”——通商贸易引起的直隶城乡社会演变，实际上就是现代化。对此，许檀（中国社科院）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她在题为《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的发言中指出：明清经济在：1、市场机制的形成；2、产业结构的逐步建立；3、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导致区域间分工和优势互补，是与近代化过程紧密相连的。明清社会既非停滞，也不是只有增长，没有发展。夏明方（中国人大）则从另外的角度维护黄宗智明清经济“过密型增长”的理论，其《生态变迁与“斯密型动力”、过密化理论——多元视野下的旧中国农村商品化问题》一文认为，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断定黄氏“过密化理论之不成立”还过于匆忙。不过，由于黄氏没有将“生态系统”分析方法贯彻到底，其理论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果能把环境成本引入小农经济成本收益核算体系之中，将有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小农经济的过密化。而香坂昌纪（日本东北院大学）《清前期对准噶尔作战的经济效果》一文则在区域间商品流通等方面表现出了与许文大体一致的旨趣。文章指出：清朝在从康熙中期到乾隆二十年前后，与准噶尔势力之间的战争中，投入了约计亿两的军费。这一方面扩大了清在西北地区的统治范围，使西域“内地化”；另一方面，不仅使这些地区经济活跃，还给中国全域带来了经济繁荣的好景气。

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引起了较多关注。王国斌（美国加州大学）在《清朝经济政策的区域性》的发言中认为，18世纪的经济政策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并没有阻碍作用，政府在经济发达地区，干预较少，而在相对落后的内地、边疆，比较注意推广发达地区的经验、技术。19世纪国家对内地经济的扶持越来越小，而沿海受外来势力的影响巨大。总体上看，19世纪中央财政能力不断扩大，而地方政府对农业经济的政策变化不大。李映发（四川大学）《清代州县政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论文指出：清代州县政权对待商品经济，一方面奉行朝廷颁布的重农抑末政策，另一方面又扶持商品经济发展。丁长青（南开大学）《晚清政府干预经济之述评》一文认为近二三百年，尤其是晚清，国家干预之不当，延缓了经济发展。张东刚（南开大学）《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一文用计量的方法论述了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政府消费支出总体上不断增长的趋势，并就政府消费支出对近代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作了探讨。

此外，黎邦正（西南师大）在《论叶淇的盐法改革和四川盐法的变化》一文中认为，不是叶淇的废除“开中制”破坏了明代的屯田制度，而是“开中制”实际已经破坏，叶淇只是

敢于面对现实，大胆进行改革。李庆新（广东社科院）《明中期海外贸易的转型与“广中事例”的诞生》一文立足“广中事例”，探讨了明中期海外贸易的转型，即贡舶贸易日趋衰落，商舶贸易则蓬勃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林延清（南开大学）《试论明代中期京畿地区庄田的膨胀和清理》一文探讨了明中期以后，京畿地区庄田的不断膨胀及嘉靖帝即位后的大力清理。彭云鹤（首都师大）《清代治河专家齐苏勒》的论文，充分肯定了齐苏勒治河成就，认为他是靳辅、陈潢之后最有成就的治河专家。桥本英一（日本东北院大学）《浅析同治四年的皇室财政改革》的论文，探讨了同治四年的皇室财政改革——即皇室财政除由户部支给外，另由外地官员解交银两直接纳入内务府银库。胡光明（天津社科院）《清末津京商会平息洋布洋货洋债风潮的历史启示》剖析了20世纪初叶，华北津京地区爆发的洋债风潮的起因、泛滥过程、中外各国政权和华洋商会组织采取的措施和结局。

在文化思想史领域，戴逸（中国人大）等人对学术史进行了探讨。他在《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的演讲中指出：考据学素有吴派、皖派之分，其后有“扬学”，晚清又有“浙学”兴起。四派在治学宗旨和方法上相近，前后相接，有师承关系，但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研究范围和治学风格。乔治忠（南开大学）《“御批通鉴辑览”考析》一文认为该书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官修前代史，对清朝官方思想、政治影响很大。鄂世镛（辽宁大学）探讨了《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认为今文经学在晚清的复兴和昌盛不仅冲击了宋学汉学的窒闷空气，而且也发挥了洗新人们头脑的作用。申龙澈（韩国庆熙大学校）《在韩国对于李卓吾的研究》一文，认为当代韩国对李贽的关注是70年代以后随着反传统思想的兴起而出现的，李贽的合理主义及尊重个性的自由思想等，将来有必要成为研究目标。

不过，这次会议关注较多的还是社会文化思潮和观念。刘志琴（中国社科院）《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指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民的社会欲望，饮食的理论从“养生”发展到“尊生”。以吃联谊，增强了士大大的凝聚力，促进文人结社的发展，而且还促发了一些有识之士产生了朦胧的生态意识。李小林（南开大学）《万历官修本朝正史活动中的求实精神与史学思潮》一文，认为万历年间所进行的官修本朝正史活动出现的求实精神是对嘉靖以来求实史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当时社会实学思潮的组成部分。李长莉（中国社科院）的《从“杨月楼案”看晚清上海士商观念的变动》指出：在社会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商业化、城市化变化的过程中，民间出现了要求社会平等、公正及肯定个体的近代性趋向，其表现出一种独立于正统观念和官方势力的姿态。在这一过程中还表现出新观念借助西方观念寻求社会合法性及与西方近代观念汇合的趋向。班玮（日本山阳学园大学）《“自由”“权利”等观念在晚清社会的形成》一文通过对“自由”“权利”二词的考释，指出：报刊书籍的普及带动了新思想广泛传播，西方语汇大量涌入。在本世纪初年这种传播尤以日本为中介，语汇变化即为一例。而价值观念亦随之改变。吴雁南（贵州师大）《“汉学”异端与清末学潮、政潮》认为“汉学”异端是传统文化转型的产物，虽仍保留着“汉学”的形式，其内核却已注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过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存在保守、复古倾向。周术槐（贵州师大）《雷铁崖与清末社会思潮》指出，在清末社会处于大动荡的时期，雷铁崖激扬文字，自成体系。其中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所迸发出来的异彩，尤为世人所瞩目。竹内弘行（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的《近代儒教与知行论》认为，阳明学在近代中国再度登场是因为宣扬这一思想的梁启超等人认为日本成功的经验在于日本儒教道德思想，即从中国阳明学中的“知行合一论”中吸取而来的“武士道”。

少数民族文化也是其中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杨涛（云南师大）《明清至民国云南各族崇尚观念中的优良传统》一文探析了云南各民族崇尚气节、礼仪、勤俭、勇敢、祖先与公德等优良传统。白新良（南开大学）《顺康雍时期八旗教育述评》一文认为，顺康雍时期的八旗教育事业，虽有波折，但总的看来，是不断发展的，从而使八旗由一个单纯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一个文化内涵深厚的政治实体。阎崇年（北京社科院）《满洲文化对京师文化之影响》一文从满洲沿用前朝都城，保存了紫禁城、入

关后划地而居，使北京形成了几个文化区，从建筑、服饰、语言、狩猎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满洲文化对京师文化的影响。全成修（南开大学）的《16 世纪末、17 世纪初格鲁派与卫拉特佛教》一文认为将四万卫拉特与四十万蒙古分开的传统看法应予以修正。包文汉（内蒙古大学）的《清代“藩部”一词考释》认为，由藩到藩部，历经变化，其趋势因各种因素由“外”逐渐靠向“内”，内外差距缩小，共同性增多。

此外，南炳文（南开大学）《成就辉煌、特色鲜明的明代文化》一文认为明代文化虽比同时代的欧洲有进步之处，但也有不少落后方面，并且差距渐有日益扩大之势。庞百腾（美国特立华大学）的《从中国第一代海军军官看中国无兵文化之转变》认为：第一代中国海军军官虽为中国的“军事化”做出了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无兵文化”的局面，但依然任重道远。张海鹏（安徽师大）《论徽商的经营文化》认为：徽商之被称为“徽骆驼”，与儒家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徽商经营观念大多与经商的道德观念紧密相关。

这次会议有关政治史的论文不多，且主要围绕着人物展开。何孝荣（南开大学）《论明成祖与佛教》指出，明成祖在位期间，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另一方面又大力对此加以提倡和保护。李梦芝（天津古籍出版社）《论弘治帝的人才思想及实践》一文从注意选拔人才、知人善任、尊重爱护人才、对选拔人才在制度上予以保证等四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弘治的用人思想及实践。王鍾翰（中央民大）《施琅的历史功过问题》一文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施琅是仅次于郑成功的英雄人物，尽管他还不能算是民族英雄。此外，刘毅（南开大学）作了《明朝皇陵祭祀制度研究》，认为明代上陵之礼虽不皆由皇帝推行，但却更加正规化，陵上的献殿具有了宗庙的某些功能。张守常（北京师大）《中国农民和近代革命》一文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农民思想觉悟的变化及与近代革命关系，认为中国农民是近代革命胜利不能不有的主力军。

科技方面，历史学者对医学的关注值得注意。汪茂和（南开大学）《明代的内丹学》认为明代内丹家上承宋元以来三教合一、性命双修的宗旨，全面突破古来丹学传承的神秘藩篱，开创了内丹学世俗化的新局面。陈捷先（台湾大学）《康熙与医学——兼论清初医学现代化》一文探讨了康熙与医学的关系，认为康熙年间，皇帝虽已重视西洋医学，但未能以政令普遍推行，致使医学现代化不能落实成功。刘耿主（中国人大）的《清宫脉案研究》利用档案考察了清代御医诊治处方，即脉案。

会议期间的交流与探讨，既开阔了与会专家的眼界，也促发代表对某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大家都认为大会开得成功，学术气氛浓，收获大。不仅如此，通过以上的总结，我们认为，这次大会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一、社会史的研究仍呈兴盛之势，其发展不仅表现为对既有问题的探讨日渐深入（如家族），也体现在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上，一些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对一些原本属于别的领域的课题作了社会史的考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二、对下层民众观念、心态和生活的研究渐趋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新潮流。这一研究的开展，除了有必要不断发掘和利用新材料外，还需要研究者对各种文献、资料的局限有所认识，并具备努力探索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涵义的问题意识。

三、开展田野调查，发掘和充分利用档案、文书等材料是产生高水平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值得大力提倡。

四、微观、个案的实证性研究仍将会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史研究的主流，但在已有微观实证性研究基础上进行宏观整体性思考也已作为一股潮流渐露端倪。

（作者周正庆　余新忠：均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邮编 300071）